萧友梅先生临终前后

邓尔敬

“八·一三”抗日战争爆发。学校自江湾迁入法租界，租了几处民房，化整为零，不挂校牌，但仍坚持招生、开学、上课。不久，战线节节西移，炮声虽已远去，而成为孤岛的上海，形势日益紧张。

1938年萧友梅校长很想将音专迁往内地，并为此经香港兼程赶往武汉与教育部会商，终因国民党政府所在的武汉也危在旦夕，不可能关心区区一所音乐学校。一方面也考虑到学校的专业教师绝大多数是由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外国乐师兼任，若要这些洋人随校内迁很不现实，因此，迁地之议作罢。

商务办理，乐艺社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主编，负责收稿、編集、计算字数、临时补白，然后写一篇编后记，就算结束一期的工作。这里还要说一点旧事，音乐杂志一椿麻烦的事情是抄谱，现在的说法是绘谱，社会上没有这一个行当，一般人又没有这一门手艺。当时凡是带有乐谱的出版物，差不多总可以看到感谢抄谱人的声明，如刘天华的曲谱就声明感谢汪颐年女士辛勤的抄谱，汪女士即黄自的夫人。赵元任的《新诗歌集》之所以能用那么美观的乐谱也声明得力于某某先生美术的手眼。《乐艺》每期三十页的乐谱因而算是一份不轻的工作，而且说一不二的全归我这个“天然助理”来承担。外界如有来信，大都由青主口授要点，由我写回信。再就是替青主查核有关材料。由于《乐艺》是同人杂志，主编例不审稿，除非是特别明显的错误的字

句或引文，才动手加以订正。

今年，汪精卫投敌，高唱曲线救国的调子，同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网罗同伙，准备在南京成立汪伪政府。许多爱国人士纷纷离开上海，有的去了大后方，有的去了苏北抗日根据地。留在上海的知名人士中，不愿与汉奸为伍的累遭暗害。暴力事件层出不穷，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萧先生自武汉回到上海不久，他中止了亲自讲授的《国乐概论》课。这以后，同学们很少在学校看见他。

有人说“萧先生病了。”

不然。

《乐艺》的出版的确引起音乐界的注意，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内容的充实，另一方面也由于印刷的讲究，然而印刷的讲究造成了使人咋舌的定价：一元八角，结果当然是销路不好。到了应该出版第七期，即第二卷第三期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的关东军已经发动了对沈阳北大营的突然袭击，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商务印书馆当即以亏损甚巨为理由，拒绝承担继续出版的义务。《乐艺》于是偃旗息鼓，关门大吉。显示乐艺社的存在的《乐艺》季刊已经没有了，乐艺社也随之趋于解体了。一年之后，音专师生重整旗鼓，组织音乐艺文社，易韦斋还风趣地说，“音乐艺文”四个字中间两字却是乐艺，仍然显示出与乐艺社一织相承的关系。不过这究竟是属于另一个组织的事了。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早晨，我便亲眼见到萧先生健步在福履里路上，而且还叮咛我说：“天冷了，应当戴顶帽子，以防感冒。”

有人说“萧先生胆小。……”

也不然。

谁能想象到萧先生当时所面临的形势是多么严峻！

萧友梅先生早年出任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和汪精卫等人有过一些交往，并与汪精卫的左右褚民谊私交甚笃。据说萧先生一家曾借住在亚尔培路褚民谊的公馆。汪、褚即将粉墨登场，与萧先生相知的人中，投伪者大有人在。为了应付复杂而险恶的环境，萧先生不得不深居简出。偶而到校办事也是来无影去无踪。这样便使自己的行踪带上了一定的神秘性。因此众说纷纭。

“萧先生病了。”——真的病了。

1940年的岁末，朱英先生突然通知我和陆仲任，要我们代表同学去医院看看萧先生。从朱英先生忧郁的神色中，知道萧先生的病很严重。

想到萧先生的名和字是友梅、雪朋，因而我们去花店买了一枝梅花，并设法弄到松竹各一枝，配成“岁寒三友”携去医院探望。

萧先生住在体仁医院，这是一家座落在辣斐德路上的私人医院，就是现在上音复兴中路教职工宿舍对过的1325号；也正是音专初创时期，一度租用作为校舍的那幢老式红砖楼房。

我们拾级而上，进入病院二楼的厅屋，屋内有通往三楼的楼梯，萧先生的病房是在楼梯后面的一个单间。房间不大，陈设简陋。病床东西向，横放在仅有的一扇西窗下。窗外的阳光被外墙所遮挡，室内很阴暗，一片微弱的光线映在萧先生清癯的脸上，卧病在床的萧先生面容显得越发苍白。

萧先生知道我们来看他，勉强打起精神，用极其疲惫的嗓音说了句：“你们很有

心。”随侍在侧的萧师母代他表示了谢意，并一再重复着萧先生的这句话。萧先生还问了关于学校上课和同学的情况，声调低沉得几乎听不太清楚。唉，病已垂危的萧先生似乎无力再说什么了，我们稍事寒暄便退出了病房。没料到这竟是我们见到萧先生的最后一面。

几天后，萧先生的病情更加恶化，小便大量出血，高烧不退，终因不治，于1940年最后一天—12月31日凌晨去世。没有讣告，没有举行大殓，也没有追悼仪式。毕生为创建音专耗尽心血，为祖国的音乐教育事业立下丰功伟绩的萧友梅先生，就这样默然地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心爱的学校，离开了那战乱的人世。终年才不过56岁。

萧先生逝世不几天，我和陆仲任去虹桥公墓参加他的葬礼。

这天，我们显然是晚到了。公墓的铁门敞开着，园内特别宁静。迎面不时吹来一阵冷风，夹杂着踏碎枯叶的声响。通道两旁排列着各式各样的墓碑，可以看出这里也是华洋共处之地。

萧先生的墓地位于墓园中间偏右的地方。一副西式灵柩早已安放在墓穴上方紧绷着的两条既宽又厚的白帆布带上。约莫十来个送葬人环绕在墓穴旁。学校教职员中除了陈洪先生、朱英先生以及当时的工友王浩川外，现在回忆不起还有哪些人在场。亲朋中到的女眷似乎只有萧师母和她的妹妹戚翠贞。她们身旁还有两个穿着孝服年仅五、六岁的小男孩。一个想必是萧先生的哲嗣萧勤，另一个可能是萧勤的表兄弟。童稚未识生死离别情，但不知他们在想什么。

葬礼出乎意料的简单，但气氛极为肃穆。没有献花圈，没人唱挽歌，没有言语，也听不见人们内心在啜泣。只觉得凝重压抑的心情随着灵柩的缓缓落入墓穴而愈来愈沉。待落葬完毕，送葬人向墓穴培上一抔黄

从两支 文艺大军想起……

1949年7月，新中国开国大典即将举行的前夕，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毛主席接见了代表们并讲了话。其中他谈到这次大会是两支文艺大军的会合。一支是从亭子间来的，一支是从山上来的。毛主席形象地概括了参加大会的同志，是来自大后方国统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两个方面的文艺工作者。还鼓励和肯定了他们在不同条件环境下作出的贡献和成绩。

在此之前，我们这支音乐队伍，为了抗日救亡的共同目标一直是协同作战的。抗战初期，解放区和大后方的音乐工作者经常有联系，张曙和林路、胡投等上海音专同学我们常有信件来往，武汉出版的《战地歌声》，冼星海、张曙等领导的群众歌咏运动，武汉合唱团和夏之秋的《歌八百壮士》等振奋人心的消息，很快传播到延安。解放区的《农村曲》、《军民进行曲》、《红樱枪》、《黄河大合唱》等许多作品，都先后在大后方的演剧队和群众中传唱并出版，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后来，反动派制造国共摩擦，用军队重重包围封锁解放区，沿途设特务和集中营阻挠、陷害进步人士。甚至我们和大后方的通讯联系也被隔断了。经过组织帮助，冲破土便各自离去了……

我懊恼没有再带上一束“岁寒三友”，奉献在萧先生墓前以祭奠先生的高风亮节。

时隔四十七个春秋，沧海桑田变化万

种种关卡的刁难，在两、三年时间里，张贞馥、姜瑞芝、李元庆、任虹、贺绿汀、苏扬才从重庆辗转来到延安，大家才断断续续地知道一点大后方音乐工作和上音同学们的情况。当时，这两支音乐队伍基本上是处于隔绝状况的。

音乐本来是从生活中来，从群众中来的。但在大后方这种自然的联系也被剥夺了，反动派不准音乐工作者到群众中去。我们身处解放区，与群众也有所脱离。这叫做“关门提高”。1942年5月，毛主席召开了著名的延安文艺界座谈会，发表了重要讲话。这时，我们开始懂得了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群众火热的的生活，体会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逐渐解决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两个问题。《讲话》以后，延安掀起了蓬勃的大秧歌运动，创作了《兄妹开荒》、《牛永贵负伤》、《运盐去》、《十二把镰刀》、《血泪仇》许许多多群众喜闻乐见的好节目。这年冬天，鲁艺文工团带着这些曲目离开延安去绥德、米脂、子洲等县采风演出。收集整理了几百首民欣，创作了《减租会》这一反映当时政策的小戏。大家熟悉的《东方红》、《秋收》、《三十里铺》，以及回到延安后，我在中共“七大”晚会和群众场合独唱过的《信天游》、《翻身道情》，都是这次

千。虹桥公墓断非昔比，只恐怕原有的许多灵寝已盈然无存。然而萧友梅先生那庄重而瘦长的身影，和他浑厚而亲切的音容笑貌，却深深铭刻在我心底。